

喪親哀傷現象學取向研究： 研究者之態度¹、反思與意識轉換

王純娟

摘 要

在二十年學術生涯中，作者觀察到喪親哀傷的現象與研究，存在著研究雙方互動後知覺差異與研究者知能與實踐差距。並且，因所審查之喪親哀傷研究稿件多採現象學取向卻呈現若干混淆，故而為此文提點該研究主題之新進研究者，請其於進行現象學取向研究時，研究方法要符合哲學觀，更要著重在研究者態度、反思與意識轉換。所要求的都是「研究者」自身。

本文強調研究態度貫穿了整個研究歷程，並進行以下論述：研究者要具備感同身受的能力，在研究歷程中，尊重喪親者為主體，從喪親者的角度出發；兩人互為主體。

本文亦討論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的「意識轉換」。藉由訪談與資料分析兩階段的「存而不論」和「想像變異」來澄清，並提及研究結果呈現。本文論述，現象學取向訪談者要持開放態度，存而不論而轉換意識狀態為純粹意識，具體操作則是訪談者與喪親者建立具信任感的訪談關係，十分專注地聆聽喪親者。「想像變異」則是研究者由少數幾位喪親者的經驗來獲得本質結構的關鍵。本文深入釐清「想像變異」以協助新進研究者理解其精義。就研究結果的呈現，本文強調研究結果是描述喪親者經驗本質的「描述文」。

本文所強調的「反思」則於以下三個段落分別提醒新進研究者：進行「反思決定態度，態度決定研究品質」的整體論述，以及研究歷程裡的訪談階段與分析階段。

¹ 本文使用「態度」和「姿態」兩詞。在本文裡大多數時候，兩詞同義；若真要區分，「態度」較是研究者執行研究時的狀態，包含意識；而「姿態」較是研究者（日常）外顯可見的表現。

關鍵詞：反思、研究態度、現象學訪談、喪親哀傷研究、意識轉換

王純娟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cw9j@gms.ndhu.edu.tw)

壹、前言：研究態度貫穿喪親哀傷研究進程

學術生涯初期，是我學習將獨力完成的研究論文投稿至學術期刊的起步，約莫同時，我也開始在諮商輔導領域擔任期刊論文的審查委員，至今有二十年的光景。二十年來，在「研究者（或論文投稿者）」和「審查委員」兩個角色之間轉換，我曾受益於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例如，曾經有審查意見略以：段落標題要寫出整個段落的重點，而非僅寫出要討論哪方面。其中，前者是站在讀者的立場，幫讀者彙整重點，後者是研究者（我）的立場，只簡單點出我在此段落要表達什麼。緣於如此的提點，逐漸地，除增進自己研究品質之外，我也暗自期許自己的審查意見也要對投稿者有所助益：除了澄清或指出不足之處，也要在該主題的研究進程、投稿者的研究能力、研究態度…等，給予建設性的回饋。我希望由此而使得研究參與者所交付予研究者的資料可以被珍惜以對，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得以進步，臺灣諮商輔導的學術發展也可以透過越來越多研究者的努力而向前邁進。

現在，產出這篇論文的起心動念，即植基於這二十年來隨著兩種角色的轉換而來的學習與體悟，故而想傳遞經驗給臺灣諮商輔導領域內新進研究者。我對「研究者」的假設如下：研究者希望在研究的執行過程與論文的撰寫，能夠顧及學術專業與品質。據此，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必會盡可能展現其專業能力，且將《人體研究法》所明文之「保障研究對象權益」研究倫理中對人的尊

重(respect for persons)、善意對待(beneficence)、公平正義(justice)與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等原則，視為最基本態度。然而，在實際的研究場域中，例如在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初期，因突如其來的震災造成無家可歸或生離死別而被迫住在組合屋的受災者，面對專家學者所帶來的調查表或問卷，我即曾聽聞受災者敬謝不敏，或最多是客客氣氣地填寫著言不及義的答案——因為震災創傷不願被挑起，也因為他們災後經歷了許多專家學者蒐集完想要的資料後就不曾回頭。同樣地，2009年八八風災之後的心理重建工作，我也曾聽聞過學校教師詢問「可不可以不要再讓小朋友畫圖了？」。像這樣，「專家學者」認定專業、重要，或是對經歷災害者有益，因而採取的行動，不見得就是「經歷者」所經驗到的。這兩相迥異的角度，在我曾審查的稿件裡也經常出現。故而我想以自己的審查經驗為基礎，為臺灣諮商輔導領域的發展，發表這篇接近論述的論文²。

臺灣諮商輔導領域的學術進程，除了就某一主題進行科學性的實證研究或系統性的實徵研究之外，論述性的學術論文目前在領域內仍屬稀少。惟，一如鳥兒要飛高才可俯瞰全景，研究者拉高視野，才可趨近領域全貌。站在學術發展的高度，我也希望本文能夠激發討論或研究者的反思。因此，我表達的對象是領域內的研究新秀。同時，以此文初試啼聲，我希望拋磚引玉，領域內更多

² 之所以稱「接近論述」，是因本文在引經據典進行論述時，確實有我個人經驗與見解包含其中。

資深研究者亦發共鳴，而得以嘉惠學術後輩研究者。

上述舉例九二一震災、八八風災已隱含了主題。由於「喪親哀傷」是我經年所審查主題之一，因此，本文聚焦在喪親哀傷主題，並認為喪親哀傷主題屬諮商輔導領域之一環。就我所審查過的此一主題稿件而言，絕大多數研究是質性研究，後續的資料分析則較多是以現象學取向的研究方法（以下簡稱「現象學研究法」）進行之。累積這些審查經驗讓我從不同稿件看到一些共同現象：一方面稿件呈現如同上述九二一震災、八八風災的例子，實際受災者所經驗到的，很可能並不只是研究者的專業能力，仍有態度；另一方面，我也發現自己審查了不同論文所提供的審查意見卻有一些共同的重點，即：對研究者「研究態度」的提醒；促請研究者的資料分析和結果報告更符哲學觀，特別是現象學的存而不論 (Epoché) 和想像變異 (imaginative variation) 的落實。因此，與其一篇一篇地將審查意見回應予投稿者，讓投稿者在研究報告完成「之後」，才得以收到對其整個研究的回應與意見，那麼，若能夠讓投稿者在研究報告完成「之前」，甚至是研究執行「之前」，就能夠對研究步驟裡的細節有會心的了解，也算是我對新進研究者多一份叮嚀與提醒。

在此，先行定義詞彙。「研究者」、「訪談者」與「(論文) 投稿者」此三詞將交互使用，隨研究階段而有異，因為這三種角色，很可能是研究歷程中不同階段的同一人或研究團隊；另外，因為本文僅討論質性研究，為省篇幅也仍尊重

協助研究的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以「參與者」取代之（在本文亦會與「喪親者」一詞交互使用）。最後，前述提到「我對研究者的假設」是研究者希望在研究的執行過程與論文的撰寫，能夠更有品質，此「品質」意指，不但最基本的如執行研究時，對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等知能的理解與實踐、撰寫時的論文格式，皆足夠符合專業要求；更進一步的是，在「保障研究對象權益」之上，研究者謹慎地、細緻地檢視自己的態度，願意站在參與者的立場，不表現得如同參與者是提供資料的「物」。此即涉及研究者研究態度及反思。

本文主張研究者的研究態度貫穿了整個研究歷程。談到「態度」，就很難不涉及研究者返回自身經驗進行檢視，即「反思」(Lynch, 2000)³，亦即，研究品質與「研究者反身檢視自己在執行研究時，對喪親者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人類工具(human instrument) (Kvale, 1996)，特別是現象學研究，研究者的主觀性(subjectivity) 涉入的程度自不待言(Finlay, 2008; Giorgi, 2009)，因此，研究者的反思就格外重要。本文主張，反思決定態度，態度決定研究品質；喪親哀傷研究者基於「尊重喪親者為主體」的反思，是確保「研究態度」的根基。故而，為研究品質的精進，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要不斷進行反思。

³ 「反思」詳細的定義將在本文第參段落第二點「研究者『尊重喪親者為主體』的研究態度，與反思『倫理』與『權力關係』息息相關」進行。

在內容呈現上，由於本文是論述性的論文，故而將不會有實徵研究必須之資料蒐集、分析、研究結果報告等段落呈現。我也沒打算照本宣科而詳論現象學研究方法的知能與步驟，假如讀者想要由這篇文章看到按部就班的操作步驟，將會非常失望。若讀者想要了解現象學研究法的研究步驟，可參考如：Giorgi (1985)、Keen (1975)、McLeod (2001, 2011)和 Moustakas (1994)等。並且，基於論文審查雙盲原則，本文將不會使用到我曾審查的稿件之資訊，以維持期刊該機制。我將以自己的話語來表達這些「共同」。若是舉例，亦非由投稿論文而來；我會使用已刊登之論文作為例子，但不代表我必然審查過該篇論文。

綜此，本文站在學術發展的高度，緣於直接聽聞專家學者在實際接觸喪親者的階段時，兩者或因站在不同立場而有的不同知覺，也看到很可能在資料分析階段時，研究者的實作與現象學哲學觀的差異，因此，以我的審查經驗為基礎，從喪親哀傷的特殊性出發，著墨「研究者實際執行研究」的角度，試圖達成以下兩個目的：一、論述研究者研究態度與反思。二、藉由在研究歷程裡現象學取向之訪談與資料分析兩階段的「存而不論」和「想像變異」，澄清現象學研究法中的意識轉換。至於本文鋪陳的邏輯如下：在前言之後，先在第貳段落介紹喪親哀傷主題論文在臺灣諮商輔導領域的發表現況，之後於第參段落論述研究態度與反思。接下來本文第肆段落深談現象學訪談的「存而不論」，這階段的反思亦接續討論。第伍段落特別闡述「想像變異」與研究結果，也接續這階

段的反思。⁴本文透過研究者的共同困境與我所強調的共同重點，期能絲毫增進臺灣喪親哀傷研究之品質。

貳、當今臺灣諮商輔導領域有關喪親哀傷主題之論文發表現況

相較於過去，當今臺灣諮商輔導領域的期刊論文投稿是有增無減，這反映出有越來越多研究者基於興趣、能力，或是工作要求，而產出論文。若以「喪親哀傷」為主題，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華藝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搜尋以下關鍵字：喪親、喪母、喪子女、喪兒、喪手足、喪同儕、同儕死亡、喪偶、遺族、逝親、親人逝去、亡親、哀傷、悲傷、哀悼、悲悼、驟逝、慟、喪慟、喪家，則可發現，此一主題多是刊登於《諮商與輔導月刊》、《安寧療護雜誌》、《護理雜誌》、《長庚護理》、《中華禮儀》、《生死學研究》與《輔導季刊》等期刊。從刊名可知，《安寧療護雜誌》、《護理雜誌》、《長庚護理》較屬醫護領域，《諮商與輔導月刊》與《輔導季刊》屬諮商輔導領域，《生死學研究》則有部分屬諮商輔導領域，有部分屬宗教、哲學、社會、喪葬禮儀…等，《中華禮儀》則以推動喪葬禮儀為目的。

若檢視諮商輔導領域幾個期刊，《諮商與輔導月刊》與《輔導季刊》皆有較多喪親哀傷主題的論文，前者未有匿名審查機制，而後者具備。若檢視具匿

⁴ 如此將「反思」拆散到各研究階段，實為行文之限。而研究歷程中，確實時時刻刻需要研究者反思；這也算把「反思」拆散之後，勉強找出的意涵。

名審查機制之期刊刊出「喪親哀傷」主題的論文來看，《輔導季刊》自 2000 年⁵以來至 2018 年 6 月止，共刊登 626 篇，其中，喪親哀傷主題有 22 篇，佔 3.51%。《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於同時期刊出的 134 篇論文，其中，喪親哀傷主題的論文有 5 篇，佔 3.7%；《輔導與諮商學報》於同時期刊出 155 篇，喪親哀傷主題者有 1 篇，佔 0.6%；《生死學研究》自 2003 年 12 月創刊、2005 年 1 月出刊第一期至 2015 年 8 月止⁶，全數共刊登 78 篇，其中，喪親哀傷主題者有 11 篇，佔 14%；2006 年底才創刊之《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至 2017 年底共刊出 88 篇論文，其中喪親哀傷主題有 2 篇，佔 2.27%。就這四份期刊的 19 篇喪親哀傷主題論文來看⁷，質性研究有 15 篇，未有量化研究，另有 3 篇為論述，1 篇是文獻回顧。若另以長年入列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的《教育心理學報》與《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自 2000 年以來刊出以「喪親哀傷」為主題的論文來看，至 2018 年 6 月止，兩期刊全數分別刊登 487 篇和 264 篇，其中，喪親哀傷主題分別有 2 篇和 5 篇，分別佔 0.41%和 1.89%。在喪親哀傷主題

中，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者《教育心理學報》有 1 篇，另《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 篇全為質性研究，以量化研究方法進行者只有在《教育心理學報》1 篇。縱使天災人禍不斷，人生歷程死亡必然，由上述數據顯見，基於很多原因，在臺灣諮商輔導領域裡，喪親哀傷主題的論文發表數量仍有極大的產出空間，特別是 TSSCI 期刊，近廿年僅刊登 7 篇，且其中 6 篇為質性研究。

在臺灣諮商輔導領域裡，喪親哀傷主題的質性研究多以「深度訪談」作為資料蒐集的方式⁸，並且強調是「半結構」的深度訪談。在真正投稿期刊時，囿於學術期刊所要求的篇幅限制，多數論文都只能幾語帶過。例如：在黃淑清、修慧蘭（2003）的研究中指出：「本研究採低結構、較具彈性的深度訪談研究法，期能因之獲得深入而有意義的資料。」（頁 221），又如蔡佩貞（2009）：「本研究以訪談法為主，…採用半結構訪談法事先設定喪親家庭的訪談主題及相關問題，訪談的內容很有彈性，是在所探討的主題內隨狀況而應變，沒有被預先設定的問題所限制。」（頁 170）

半結構的深度訪談完成後，研究者將訪談歷程集中於逐字稿⁹，亦即，逐字

⁵ 九二一大地震是臺灣首度重視災後心理重建的大型災害（李明亮，2001）。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次年，學術論著開始有產出的可能。

⁶ 無論是南華大學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庫、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或是華藝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皆記錄《生死學研究》出刊至 2015 年 8 月，第 18 期。

⁷ 因為《臺灣諮商心理學報》於 2012 年 8 月才創刊，故而先不納入。

⁸ 例如，《教育心理學報》與《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的 6 篇質性研究中，有 5 篇採用深度訪談。

⁹ 至於訪談錄音檔和所謄寫的逐字稿是主體或客體？由於錄音檔的逐字稿裝載的是參與者的經驗，而參與者的經驗是客體（van Manen, 1997），再加上錄音檔和逐字稿需要妥善保管（人無此需要），而且研究者可隨自己的需要，取出閱讀無限多次，這些因素都讓錄音檔和逐字稿傾向是客

稿是將參與者所表達的，以文字化的呈現方式，它也是研究者在接下來進行分析時，所仰賴的原始資料(Kvale, 1996)。研究者將參與者在訪談中所敘述的內容，與非口語的訊息如神情、口吻、思考和動作，都謄寫成逐字稿（陳向明，2002），再交還予參與者檢視、修正無誤，而且再次確定允許釋出逐字稿的內容，這份逐字稿就成為研究者後續真正據以分析的原始資料。

質性資料需要研究者潛心以對。在分析階段，研究者是以「投降」的態度遍讀逐字稿，站在參與者的角度，全然接受逐字稿的內容（陳向明，2002）。在資料分析初期，其步驟並不出陳向明所彙整：一、研究者反覆閱讀所有資料，得到一個全面性的了解；二、再重新從頭閱讀，由反覆出現的語句看到型態(pattern)，找出意義單元(meaning unit)，再由各相似屬性(property)的意義單元，整合成主軸(theme)。雖然在找到主軸之後，許多方法的分析程序才有異，但很多研究都在此停止分析，之後就撰寫研究結果。「研究結果」部分，本文將在第伍段落討論。

就我所審查過的稿件而言，喪親哀傷主題有 11 篇¹⁰（其中 4 篇有複審）。當中質性研究有 8 篇，量化研究 1 篇，

體。但是，錄音檔和逐字稿如同參與者本人，都需要研究者無數次地閱讀，才可能找得到隱而難顯的真義。另外，當研究者聽錄音檔或閱讀逐字稿時，參與者的故事躍出書面，宛如參與者在場，歷歷在目；從這點來看，錄音檔和逐字稿或有幾分主體。

¹⁰ 若同一篇稿件有經歷複審，亦僅算一篇。

文獻回顧 2 篇，論述式則無，並且，這 8 篇質性研究皆以「深度訪談」作為資料蒐集的方法，6 篇的資料分析宣稱以現象學取向進行之。這些喪親哀傷主題的論文，與前述 TSSCI 期刊《教育心理學報》與《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論文在「多為以『深度訪談』蒐集資料的『質性研究』」的趨勢一致。因此，本文主要是談質性研究。以下我將由喪親哀傷主題的特殊性出發，站在學術發展的高度，由回應予投稿者的審查意見開展出去，談論研究者面對參與者的研究態度，以及研究方法裡的「訪談」和「想像變異」等需要意識轉換之步驟，表述我個人強調以「喪親者的知覺」為準，以參照原典¹¹的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為重。

參、由死亡「終極、不可逆」的特殊性，論研究者執行喪親哀傷研究之研究態度與反思

一、喪親哀傷之特殊性

對於死亡具「終極、不可逆」特殊性的討論，由於「死亡」是人由「生」走向人生旅途的另一端，因此，本文僅由「生命」與「人生」角度，檢視死亡之「終極」(Wallbank, 1991)與「不可逆」(irreversibility)¹²之特殊性。

¹¹ 本文所稱之「原典」，是指要追溯至英文論著。因為，雖然有些論著之原著非為英文（如：現象學創始人 Husserl 以德文論著），但是，多數在臺灣諮商輔導領域的研究者熟悉的語文多為中文和英文，英文也確是國際通用語言，故而追溯至英文論著即已足夠。

¹² 「不可逆（性）」主要是熱力學、物理、

由「生命」而言，年齡、發展是不可逆，許多疾病也是不可逆，卻有彌補的機會。對於年齡的不可逆，或許令人感傷，但人們或可由獲得智慧而堪告慰。臟器的壞死，如：慢性腎衰竭、退化性關節炎…等，也皆是不可逆的歷程（台安醫院，2017；蘇鈺壬，2017），但站在「生命延續」的立場，若是透過移植臟器、置換人工關節等彌補方式，這個人仍是存活，親友仍得以見到此人。這樣的不可逆，人們還能跟老天爺討價還價，也可能延長存活時間。但若不可逆的疾病持續發展，隨著時間流逝或病徵惡化，此人便逐步走向死亡。

由「人生」的角度來看，人生難料，失落難免。人人都可能面對失戀、失業、搬家、離婚、財物損失，這些「失」讓舊的人事物或關係不再，但是，舊人或許仍在世界某個角落，有相逢的可能，也可能會有新人出現，我們與舊人或許能夠互相建立另一種現世的關係，甚至有回復的可能。財物損失，可以再賺回來；房子震垮，可以原地重建。過去所擁有雖已不可追回，但是新的人事物或關係某種程度仍可以補前復舊，也一切都還有希望。

就只有死亡，一死百了，無所轉圜。死亡與前述生命角度的不可逆、人生角度的失落的差異，恐怕是在於其「不可逆性」最為終極。人死去，未有復生之可能，生者最多只能在夢裡相見，或只能觀落陰，而不可能再與之共處一個空間，共同編織生命故事。縱使是複製

人，亦只是一位相同基因的個體，其生命歷程、經驗與成就，都已不能重來。「死亡」如此之特殊性，恐非生命其他不可逆與人生的失落所可望其項背。

死亡雖然如此特殊且終極，但無人可免「終將一死」之命運。若非自己先死去，那麼，面臨親友的逝去便具普遍性，亦即，人生在世，「喪親」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生命經驗，然而，不同喪親者在不同時程的哀傷反應都極具個別性與多樣性（如：Bowlby, 1980; Lehman, Ellard, & Wortman, 1986; Parkes, 2002; Shuchter & Zisook, 1993），在諮商實務，或在生活經驗裡，或許您我只要近身理解幾位喪親者，便可知哀傷反應的個別差異。王純娟（2016）亦指出，「人終有一日必為喪親者，卻也無人能分擔任何一位喪親者切身的哀傷經驗」（頁 357），一語道出喪親哀傷的「普遍性」與「個別性」。

面對「死亡」如此不可逆的生命必然，但是人類又無能面對死亡。就像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所言：「人無法直視太陽和死亡」（引自 Simpson, 1979; Wahl, 1959），既然無法直視，便難以一窺究竟。僅僅是「談論」死亡，多數人往往避之唯恐不及，以理性把死亡話題推開，甚至聽到有人提到「死」字就轉移話題或嫌不吉利；「四」與「死」諧音，所以車牌、身分證件、有些醫院的樓層…等，都儘可能避免「四」。

「死亡」主題既如此令人退避三舍，喪親卻是難免。而喪親者哀慟逾恆之餘，卻又願意為協助其他喪親者（王純娟，2016；林家瑩，1999；Cook & Bosley, 1995；Edelstein, 1984；Janzen, Cadell, &

化學等自然科學領域所探討。該領域已非我能力所及，亦與「生命」較無關，故而暫不探討。

Westhues, 2004)、為學術進程或協助研究者，而答應受邀訪談，那麼，作研究的人對待喪親者的「態度」，就格外重要。「態度」與「反思」，實難分割。以下將一併論述之。

二、研究者「尊重喪親者為主體」的研究態度，與反思「倫理」與「權力關係」息息相關

讓我先從研究者的角度談起，再轉到喪親者。作研究是一條孤寂的路，在作出研究結果之前，是研究者長期的投入與沈潛；或曰「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而作研究可能面臨「無處發表」的窘境，可能連「臺上一分鐘」的機會都不一定有。在喪親哀傷主題廿年光景，種種因緣際會——讀文獻、聆聽喪親者、與訪談資料相處、指導學生論文、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與觀察…等，讓我理解：能夠作研究或許是天賜的榮幸(privilege)；基於很多原因，喪親者把他們的苦難經驗交給我們——有能力進行研究、製造知識的人，若我們研究者真的能夠感受到喪親者的苦痛，在執行研究的時時刻刻，恐怕都要記得這些資料反映他們的苦難，那麼，對他們及他們所提供的原始資料就要格外尊重。這份「『來自感同身受』的尊重」，若能夠真切地反映在研究歷程中，那麼，即是在進行每個步驟時，確實依符合哲學觀的研究方法，切實進行，更不忘喪親者是「主體」。

上述我請研究者要能夠「感受到喪親者的苦痛」，隱含有「喪親者本為主體」之意；喪親者先有感受，研究者才有「感同身受」的可能。在研究中，所謂

「主體」是個體需要儘可能地知覺、洞察、理解(discern)，以將經驗(object)最豐厚、最深層地呈現出來(van Manen, 1997)。相對於「主體」者，是客體。「客體」只是「被」表達、「被」對待，例如：經驗。而「主體」會有想法、感受，van Manen 指出，「主體」所強調的是個人的、獨特的方式。若把喪親者的人生視為「歷程」來看，他們是由很多故事、經驗而形成現在的自己，自然也會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和應對世界的方法。喪親者作為主體，為了協助研究，在研究中，透過與訪談者的互動，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身經驗；訪談者在言談中，邀請喪親者儘可能將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抽絲剝繭。所以，在研究中，喪親者是主體，而研究者所要研究的現象則是客體，其因之而邀請的喪親者所描述的「個人經驗」也是客體，所以上方的「經驗」原文實為“object”。回到喪親哀傷主題，「死亡」是如此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類經驗，喪親者卻首當其衝；死亡之難談，已如前述，每個人也都有自己表達哀傷的方式，因此，「喪親者」的角度和獨特性必須真實地被重視，研究者要避免將喪親者視為客體，甚至以為他們只是提供資料的「工具」。

對諮商輔導領域的工作者而言，這「尊重喪親者為主體」之精神，其實一點都不難理解。然而，當真正執行研究時，卻可能面臨「知易行難」的窘境。就我所審查的文稿中，明顯可見文字中隱含「學術專業、研究者蒐集資料的重要性在前，喪親者提供資料後即消失」姿態的事例佔了絕大多數審查文稿：這些質性研究之研究目的具方向性，即進

行研究僅爲了支持某一理論或論點，或支持研究者的預設立場，例如：研究者認爲喪葬儀式或宗教信仰對喪親者的哀傷反應有所助益或具有功能；或研究目的在於支持研究者所進行的哀傷心理介入（如：團體、工作坊）的成效，且假設由專家學者所設計、所帶領的心理介入，喪親者必然會好轉或走出來。因此，在論文的前言與文獻探討、以及研究執行都隱含上述的假設姿態(*assumptive attitude*)。爲達成此隱含的假設姿態，研究者編擬的訪談題綱極具引導性，研究結果也不意外地呈現研究者的預設立場獲得支持或所設計執行的心理介入必然有成效。有些研究者在緒論強調該研究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但實際使用的研究工具卻勉強以現有的、卻與該研究對象有別的測驗工具，或不同研究方法的名詞隨意拼湊，而難以相信研究者確知其理。如此，幾乎不見「尊重喪親者爲主體」之研究執行。另外，有些研究者取得資料之後，僅作大分類，甚至訪談資料可能連編碼也沒有，遑論分析。這些都隱含有「喪親者的功能是提供資料，提供完資料之後就被消失於研究之外」之意，甚至連原始資料都被粗糙地對待。喪親者如同被工具化，僅具功能性的客體。此斷非領域內所培育出之研究態度。

我相信這些研究者與諮商輔導領域大多數研究者一樣，對喪親者都願意尊重以對，然而在實際執行時卻已遠離如此之姿態，讓在研究中的喪親者不再是「主體」。若「主體」不存在，「互爲主體」將成爲空中樓閣。何以故？所謂「互爲主體」是指一個人與「他者」的關

係是一種共存(*copresence*)，即如「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般的共存（Moustakas, 1994, 頁 37），若喪親者非爲「主體」，訪談者就沒有一個內在在世界得以感同身受¹³了，就沒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般共存的可能，自然也沒有「互爲主體」的可能。以諮商輔導領域至少七年的培訓，且研究者亦不乏具博士學位者而言，我認爲會造成如此，恐非因爲專業知能不足，而是跟倫理與權力關係有關。因爲，雖然學術專業知能與倫理息息相關(Cook, 1995)，而人際互動（如：聯繫、訪談）也難以逃避倫理與權力關係的展現(Brinkmann & Kvale, 2005)，因此，縱使我們以爲具備專業知能的研究者理應表現符合倫理且與參與者建立平權關係(*egalitarian relations*)，但研究者有可能在進行學術研究時，遺忘了倫理思考與倫理行動，因此，便需要檢視自己的主觀性以及與參與者的權力關係。在人際互動中，倫理是互動的兩方或多方的相對位置；也是彼此權力的流動(Karnieli-Miller, Strier, & Pessach, 2009)。縱使人們在互動中並不必然討論倫理，他們的言行舉止其實還是表現出他們在倫理上所站的位置(say a great deal about where they stand ethically)，這在研究者與喪親者皆然(Rosenblatt, 1995)。一份研究計畫符合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簡稱 IRB)的要求只是「

¹³ 這裡強調的是，喪親者與研究者互爲「主體」，喪親者的內在感知，研究者得以觸動，後者才可能有後續的行動。因此，研究者若能對喪親者「感同身受」，即已足夠。

尊重喪親者」的開始(Cook, 1995; Rosenblatt, 1995)，研究者的任何行動都反映他們所秉持的倫理，也反映權力關係(Brinkmann & Kvale, 2005; Karnieli-Miller et al., 2009)。Karnieli-Miller 等人(2009)表示，雖然質性研究的研究者和參與者往往是合作的夥伴關係，但兩者在權力關係上也可能彼此是衝突的。例如：研究者給出某種聯繫方式（而不是另種）予參與者，其考量為何？與喪親者的聯繫是由研究團隊中的哪一成員來擔任？或如何分工？訪談的頻率與時間長短是站在什麼角度進行考量？研究報告初稿是否交給參與者過目？還有更多例子，皆可信手拈來，在在可見研究者與喪親者的在倫理裡所站的「相對位置」。整體而言，研究者在與喪親者互動時，在「倫理」與「權力關係」的思考與覺察、敏感，而採取或調整的行動，就反映在點點滴滴的研究行動中是否尊重喪親者為主體，這也影響喪親者給出完整經驗的意願。

為「尊重喪親者為主體」得以達成，我認為研究者在「意願」之上，還需要具備能力，以及研究者的反思。就「意願」而言，若研究者對喪親者真心願意「主體」相待，真心想要接收喪親者送出的訊息，真心想要體會喪親者的哀傷，如此即已足夠。因為，意願是「奇特的內在行動，它位在自願行動之前，且可能成為自願行動之始」（Pfänder, 1900/1967, 頁 21）。研究者的內在若無「意願」這份內在行動浮現，接下來的「能力」和「反思」皆是徒然。就「能力」而言，諮商輔導領域的培訓恰為利器，亦為基礎：無論在理論知能與

研究方法，或是在實務方面，「關係建立」的能力，對人際互動與對方意在言外的表達的敏感度，以及向內自我觀照的能力…等，都支撐喪親哀傷主題研究者在哀傷理論知能之外，能夠站在喪親者的立場體會，從喪親者的視野望出，體會他們的喪親之慟，望向他們所看到的世界；這同時，研究者也不斷覺察自己內在脈動，也就是「反思」。以下的論述，將從定義開始。

「自我覺察」及「自我檢視」一直是諮商輔導領域所強調的能力，近年，也逐漸轉換為「反思」一詞¹⁴。惟，由我的教學生涯中所見之學生反思作業而知，諮商輔導領域的新秀們，經常將「反思」與「反省」、「檢討」混淆，或將「反思」視為「心得」；並且，領域內的質性研究方法學術論著中，若是著重研究步驟操作者（如：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Creswell, 1998；Patton, 1990），往往未有「反思」之討論，新進者或許更不易摸索。這種現象反映出「反思」的概念或定義需要釐清。

Archer (2007)將反思定義為「思索『自己相對於所在的（社會）情境、所在的（社會）情境相對於自己』的心理能力的經常活動。這心理能力是一般人都有的。」（頁 4）。Lynch (2000)表示，「反思」著重的是返回自身，有意識地覺察、深思熟慮與抉擇。Lincoln 和 Guba (2000)指出，「反思」是研究者「批判性地映照自己」的歷程；研究者利用內在對話不斷檢視自己所知與如何得知

¹⁴ 這樣的表述方式隱含「反思」、「自我覺察」及「自我檢視」三詞同義。

(Berg, 2004)°McLeod (2011)指研究者的反思(researcher reflexivity)涉及意願和能力，即研究者「讓研究歷程清晰(explicit)」的意願，與「回到自己經驗」的能力。期間，或許最常被提醒的檢視是：研究者是否隱微地帶著假設（如：胡幼慧，1996；嚴祥鸞，1996）？這個檢視幾可貫穿整個研究歷程。我認為，研究者以下檢視亦為重要：「我如何看待面臨喪親的人？脆弱不堪？一蹶不振？是我的研究資料來源？」；「我表達的是『感同身受的尊重』或是『僅及腦袋的尊重』或…？」

因此，「反思」是研究者覺察、思索與決策跟自己有關的、自己與周遭相對的關係、與何以是如此的相對存在，將之清晰呈現在研究歷程中(Matton, 2003; McLeod, 2011)。「周遭」若是在研究歷程中，可能是研究者所相對之「參與者」，在研究論文的呈現上，是研究者所相對的「讀者」。「周遭」也可能是研究者所相對之「學術領域主流價值」。就參與者來說，參與者的位置就是只有在同意接受訪談、提供自己的喪親經驗時權力較高嗎(Karnieli-Miller et al., 2009)？參與者在信任關係中向研究者描述的喪親經驗，最後化為冷靜分析的研究論文並公開出版，這之間的反差，其中的倫理議題為何？這差異有無拉近的可能？就讀者而言，讀者若只能知道研究結果而無法得知研究歷程中研究者的思索和反思，其與研究者相對之倫理與權力關係為何？就相對於學術領域而言，研究者是否背書了學術領域主流價值或照單全收學術前輩的傳承？前者（相對於參與者）牽涉到微觀的倫理(microethics of

research)，即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研究倫理，後者（相對於讀者與學術領域）是鉅觀的倫理(macroethics of research)，是所產出的知識在領域內與對人類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Brinkmann & Kvale, 2005)。兩者權力關係的檢視，本文提出許多可思索之處，Karnieli-Miller 等人(2009)則說，最好是在實際研究歷程中進行檢視。那麼，就需要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以「『感同身受地尊重』喪親者」為原則，敏覺與檢視可能的倫理議題，並勇敢面對。

若研究者真正能夠避免將喪親者視為客體，那麼，對喪親者「感同身受的尊重」油然而生，研究者就可能難以任憑喪親者的哀傷經驗被理論框住、被訪談大綱侷限。有如此「感同身受的尊重」，研究者不只是按部就班地執行研究，更是努力貼近喪親者的經驗，更能讓研究有溫度、有品質。喪親哀傷學術發展一百多年來，著作浩瀚，若研究者不具知能，可以翻閱文獻書籍；然而研究態度無可翻閱，則無所依¹⁵。換到喪親者的立場，一如本文前言提及九二一震災、八八風災的例子，喪親者或受災者並沒有否定專家學者的專業能力，惟於能力之外，喪親者或受災者更能夠感受到的是研究者的「態度」。我認為，是站在「尊重喪親者為主體，研究者要求自己」這樣的位置，我們研究者作研究。讀者或亦可見，本文主張，為研究品質的

¹⁵ 關於研究態度的培養，新進研究者或許只能向自己內在探詢、檢視。若是向外，或許是觀察嚴謹的資深者與由他們的身教而潛移默化。因此，本文初步嘗試把「具備研究態度」的重點說出。

提昇，所進行的努力，都是研究者的「自我要求」。

研究者的「自我要求」也包括研究之外的檢視。研究者要不斷反思，潛心自問，研究者要由此研究獲得什麼？是學術進程？是為喪親族群的處境？或是自我利益，例如：工作、研究績效點數、升等晉薪、個人學術聲望？若研究者潛心反思，發現答案有很多與「自己」有關之因素（也反映了與他者的相對位置），那麼，研究者將難以避免把喪親者客體化，訪談關係亦可能受到影響。這樣時時刻刻的反思，我認為即是拉近研究者「知」與「行」之間距離的方法。

因為這篇論文預設的讀者是喪親哀傷主題的新進研究者，對於研究方法應是有所理解，以下，我便就審查稿件所見，由研究歷程中較為混淆或知行有距的階段——即與喪親者接觸最多的「訪談」，以及現象學分析方法中的「想像變異」進行討論。並在每一段落末端討論研究者的反思。

肆、論現象學取向的訪談姿態，與研究者反思

訪談——通常臺灣諮商輔導領域是以「深度訪談」表示——是研究者與參與者最多實質接觸的研究步驟。它由參與者和訪談者共同構築而成。對諮商輔導領域內的研究者而言，「訪談」是不難理解的研究步驟。然而，由我所審查過的文稿中可見——同臺灣喪親哀傷主題質性研究的趨勢——有研究者宣稱進行「深度訪談」，或另有研究者表示「採開放的態度」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說「訪談題綱僅為參考」，希望參與者

不至於受研究者的理論取向、邏輯…等前概念之框架所侷限；惟，研究者實際所執行的，是否必然是深度訪談，或是否真的未依訪談題綱的問答或未依理論模式呈現研究結果，值得檢視。

或許，這些宣稱宛如 Lichtman (1982) 所說的「結構性的潛意識」(structural unconscious)，亦即個體往往沒有覺察自己的行為與思考方式是受到社會情境或社會關係所形塑 (Burkitt, 2008; Oxford, 2008)。舉例來說，Burkitt (2008) 和 Silverman 和 Klass (1996) 都提到，喪親者若是表現得哀傷、哭泣，需要旁人支持，這並不符合西方個人主義社會強調獨立、自主的社會氛圍，所以人們就認為他們太脆弱，甚至生病了。再如，在當今臺灣社會法律規定之下（如：火葬），研究可能只涉及個體對大環境（法律規定內）的適應或看法，而無涉個體對制度的挑戰和行動（如：選擇土葬）。放到學術領域來看，許多喪親哀傷研究是否順著領域內主流價值或熱門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而不自知？例如：是否認為學諮商輔導就是為了助人，主題便不乏「復原」、「調適」或「介入」？再如，新進研究者是否未檢視自己對學術前輩的順從，未多加思考與覺察自己的想法與決定，與對研究方法的理理解，就認為遵循前輩的指示來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肯定沒錯？

而本文是探討喪親哀傷主題。這個主題的訪談很可能引發情緒 (Rosenblatt, 1995)，並不適合以結構性的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 來進行 (Fontana & Frey, 2003)，反而是要有極佳的聆聽 (excellent listening) 的人提供大量的同

理與溫暖(Rosenblatt, 1995)。若談及此，訪談者除了如前一段落所言之研究態度——意願、能力、反思——之外，站在喪親者的角度，喪親者希望訪談者要是一個同理、溫暖、關心、仁慈、溫柔、善解、真誠、不批判、感興趣的人(Brice, 1991a; Cook, 1995; Cook & Bosley, 1995; Janzen et al., 2004; Jordan & Neimeyer, 2003; Rosenblatt, 1995, 1997)。Cook 和 Bosley (1995)與 Lehman 等人(1986)也表示喪親者願意對「過來人」訴說。在此可以清楚看到，在喪親哀傷研究裡一再出現「喪親者需要的是『同理』和『溫暖』的訪談者」的說法，甚至喪親者需要訪談者「大量」的這些態度或特質。

基於本文一再強調的「尊重喪親者為主體」，以及喪親者對「訪談者特質與態度」之期待，以下將談及「現象學取向的訪談」(簡稱為「現象學訪談」)，在介紹其特性之後，從研究者實作的立場，就內在「意識狀態」與外顯的「關係建立」一體兩面來探討如何進行現象學訪談。

一、現象學取向之訪談需要訪談者將日常的「經驗意識」轉換為「純粹意識」

Keen (1975)指出，現象學取向資料蒐集的目的在於理解現象的意涵，而這些意涵是該現象在自然情境中所早已呈現出來的。若是以「訪談」作為資料蒐集之方式，現象學訪談是指訪談者與參與者之間的非正式的、互動的歷程，在開放的、互動的歷程中，訪談者透過開放式的回應(comments)或提問(questions)，達成由參與者的角度出發

，喚起其個人在該研究現象之完整經驗，這也是現象學訪談的目的(Kruger, 1979; Moustakas, 1994)。綜合來看，現象學訪談是由「參與者的角度」出發，在無受到專家的理論框架壓迫、也非實驗控制般的情境中，讓該現象原本存在的意涵，由理解參與者的經驗而得以完整浮現。

從訪談者的主觀世界來看，訪談者要用全新開放的視野去看到喪親者的經驗，要達成自己的視野只有喪親者的經驗，宛如看到喪親者會看到的現象、體會到的經驗。這就需要現象學的存而不論(Epoché)¹⁶(Moustakas, 1994)。一般我們對「存而不論」很耳熟能詳的定義是「要將前概念、既有的理解…等放一旁」，除此之外，吳汝鈞(2001b)對「存而不論」有很白話的說法：

「對有關世界或外界存在的設定或假定抱保留的、懷疑的態度，暫時不對它們作出任何判斷，不肯定，也不否定外在世界的存在。」(頁 16)

「存而不論」應用到研究訪談時，當喪親者所訴說的哀傷可能不符合——例如——Kübler-Ross (1969)的臨終五階段論，或也不若 Stroebe 和 Schut (1999)的「因應喪親之二元擺盪歷程(the dual process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所說的，擺盪在失落導向(loss-orientation)和重建導向(restoration-orientation)之間，訪談者可能震驚於喪親者的經驗何以跟理論不同

¹⁶ 這個詞彙，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例如：中文的學者吳汝鈞(2001b)與張燦輝(1996)分別將之翻譯為「懸置」、「懸擱」。

，懊惱於接下來要如何分析資料，因此決定下次的訪談要特別蒐集到與理論模式有關的資料。當覺察到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和情緒時，訪談者應迅即把這些想法和情緒加括號或置入括弧（張燦輝，1996；McLeod, 2001），以全新、開放的視野，回到喪親者的經驗，訪談者眼裡只有喪親者的經驗，如此即如同張燦輝（1996）所言：「排除了這個普遍設定，並將世界的信念設定判為無效」（頁 110），在此例即是「排除了『理論為真』這個普遍設定，並將對『理論為真』的信念設定判為無效」，從理論中解放，回到喪親者的哀傷經驗。

若以「立場」來看，假如訪談者在實際執行訪談之前所設計的訪談題綱是依理論模式而來，真正執行訪談時，雖然提問順序與遣詞用句可能隨不同喪親者而有所調整，或僅為「參考」、「藍圖」，然而，這樣的訪談恐怕是喪親者在研究者意欲「符合理論模式」的前提下，來蒐集喪親者的經驗資料，這與單純「由此位喪親者的經驗出發」的角度¹⁷有異，喪親者已非「主體」，訪談者亦不可能與之「互為主體」。這樣「在理論架構下，了解喪親者的經驗」或「理論模式在前，喪親者在後」的視野，已遠離現

象學取向。現象學訪談需要訪談者運用「存而不論」，不會讓理論架構的重要性大於經歷者的經驗。

若以「意識狀態」來看，當訪談者的意識存有訪談題綱、理論架構，即為自然態度¹⁸，未及「存而不論」；待訪談者將訪談題綱、理論架構、他我好壞對錯之別等，全數置入括弧，訪談者的主觀狀態由日常的自然態度轉變為超越態度(McLeod, 2001)，其意識狀態臻於「純粹意識」（吳汝鈞，2001b，2001c；陳榮華，1990；Brough, 1991；Husserl, 1913/2002；Spiegelberg, 1982），此時，個體超越主體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主客對立關係也不復存在（吳汝鈞，2001b，2001c）。這是採取現象學取向的訪談者應有的意識狀態。

「意識的轉換」在現象學裡一直是重要的課題。上述「當聽到喪親者所訴說的哀傷可能不符合喪親哀傷理論，訪談者震驚、懊惱、下定決心的反應」的例子即屬意識的轉換。在訪談歷程中，當訪談者的意識意向著喪親者的哀傷經驗，未有其他，這就是運用了「存而不論」，訪談者的意識臻於純粹；但是當訪談者震驚、懊惱、下定決心，思緒已想到未來的資料分析該當如何，此時，訪談者的意識已未能意向著喪親者的哀傷經驗，不再處於「存而不論」的狀態，而返回自然態度。這一切意識的轉換，

¹⁷ 「由喪親者的經驗出發」的訪談，例如，Stevick (1971)在研究「生氣」時，對每位參與者都是如此提問：「請回想上次你生氣的時候。告訴我那個情況、你感覺了、說了或做了什麼。」（頁 135）。Brice (1991b)以現象學訪談蒐集「母親的哀傷經驗」時，對每一位母親都以「請描述妳為孩子哀傷的經驗」為開頭，接下來的提問是由母親來帶領（頁 20-21）。

¹⁸ 所謂自然態度，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事物的前概念，像是對美醜是非善惡等有既定看法(Keen, 1975; McLeod, 2011)。在此處，即是研究者對訪談題綱、理論架構「理所當然的理解」（Finlay, 2008, 頁 2）。

甚至流動，都是稍縱即逝，因此，或可說「存而不論」是間歇的(intermittent)，Moustakas (1994)也說「存而不論」極少被完美達成。因此，訪談者或研究者要不斷地檢視自己的意識狀態。這將在下一段落進行論述。

但在實際執行上，要如何達成「存而不論」呢？訪談者的意識要如何意向著喪親者的哀傷經驗？Moustakas (1994)說道，訪談者需要非常地、持續地專注與處在當下。他與 Keen (1975)都支持，研究者持開放的態度才可聽到參與者所表達經驗內在既有的意義(inherent meaningfulness)。至於「開放的態度」是如何？Dalberg、Drew 和 Nyström (2008)認為「開放」是「真實『傾聽、看見和理解』的意願；它包含了尊重、對所研究現象的謙遜(humility)，以及敏感度和彈性」(頁 98)。另外，以現象學為理論建構基礎的個人中心學派(person-centered approach, 簡稱 PCA) (Raskin & Rogers, 2005; Rychlak, 1981)尊重案主的知覺與感受；PCA 所提到治療師的一致、無條件正向關懷、同理三態度中之無條件正向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就是無條件接納。我認為，其中的「無條件性」(unconditionality)與「存而不論」相仿：「無條件性」是指無論案主表達、舉止如何，心理師的尊重姿態皆一致，平等看待，世俗的「應然」已然全數放空(genuinely naïve) (Bozarth, 1998)，治療師「與各種外相等距」的姿態，具備能容納各種是非對錯好壞而不評斷的「心

量」¹⁹。這「全數放空」是：「未有『接下來會發生何事』或『案主會變成如何』之前概念。當一個人真正地同理案主，與案主同頻，且放掉自己的自我，那麼，無論接下來發生了什麼，都可能明顯地與案主有所連結」(Bozarth, 1998, 頁 80)。

「無條件性」若是放到研究訪談來看，即如「存而不論」，訪談者讓自己不作評斷，戒除日常自然的看法(Moustakas, 1994)，聆聽喪親者就如同是第一次全新聽到，無有例外。綜合而言，即是訪談者在訪談當下非常願意且專注地、持續地聆聽喪親者。另外，對於「存而不論」的操作，比較特別的是 McLeod (2001)的看法：「存而不論」需要研究者有意願與勇氣，因為它要研究者離開自己一直以來熟悉之價值觀、邏輯、對世界的理解與信念、理論架構等；要離開舒適圈，是要冒險的。若研究者固守自己的真理、價值，那麼就很難冒險，邁向未知——此「未知」即是喪親者作為主體時的內在經驗。甚至，若研究者自恃能夠製造知識、處於「位階在上」的優越（這可能是「結構性潛意識」），那麼就很難有意願「存而不論」而潛意識地選擇固守既有。

在訪談者「存而不論」的意識狀態下，其「無條件性」讓自己得以暫時放下自己守持已久的信念，訪談者如大海

¹⁹ 「心量」的說法源於大乘佛教經典《楞伽經》卷三：「謂心起妄想，對外境起種種度量。此為凡夫之心量。如來真證之心量，則遠離一切所緣、能緣，而住於無心。」。本文所指治療師的心量，當如後者。

般的心量容納喪親者的所有表達，此時兩人互動裡有的只是訪談者「真實理解喪親者」的意願與謙遜，有的只是訪談者全心全意地意向著喪親者的經驗，喪親者與訪談者的訪談關係也就建立起來了。

二、現象學訪談姿態促成訪談關係的建立

若以外顯的「關係建立」來談，喪親者與訪談者兩人如此的互動，必涉「關係」。實際進行時，研究訪談並非硬生生地向喪親者索取資料，就像心理治療不是直接幫案主解決問題或直接提供專家的建議，所以訪談者要與喪親者建立關係。「關係建立」是有效心理治療的基石。Yalom (2000)就說了：是「關係」帶來療癒(it is the relationship that heals) (頁 98)。訪談並非心理治療，訪談者也並不治療喪親者，但治療關係中有極重要的「信任」成份(張進上，2006)，也是訪談中所需要(Moustakas, 1994)；並且，「哀傷經驗的表達」本身即具治療性(therapeutic) (Parkes, 1995)。一份信任關係促使喪親者願意將完整的經驗說出(Karnieli-Miller et al., 2009)。

在實際進行喪親哀傷研究時，若要訪談關係得以建立，訪談者在整個訪談歷程要營造一個具放鬆、信任特質的氛圍(Moustakas, 1994)，在其中，喪親者的陌生感與心理防衛，或許能夠逐漸被說的需求(Brice, 1991a, 1991b; Kübler-Ross, 1969)、想要被了解的需求(Kübler-Ross, 1969; McKay & Tighe, 2013)所取代，終而願意暢所欲言。Patton (1990)認為如此氛圍的營造是訪談者的責任，「『讓參與者帶領訪談者進入其內

在世界』成為可能」(Patton, 1990, 頁 279)。現象學訪談也強調由參與者帶領訪談者(Brice, 1991b; Kruger, 1979)。

那麼，當面對喪親者，研究者建立起訪談關係之時，兩人又是如何達成「互為主體」？Moustakas (1994)表示，訪談歷程中，「同理」是互為主體的方法。Rogers 在晚年(1986)說自己所表達的同理即是檢視知覺(test perception)，Bozarth (1998)也表示「同理」是表達「無條件性」最純粹的方式。亦即，現象學訪談者意識意向著喪親者的經驗，非常開放、自在、專注地且持續地聆聽喪親者，再向喪親者檢視自己所聽到的是否正確；若有提問，訪談者不但要「由喪親者的經驗出發」來進行開放式的提問，例如：訪談者聽完參與者一段敘述之後回應：「你提到你既然夢不到他，你就想要努力把他生回來，我覺得你或許是很思念他，好像也害怕他不理你了，不知是否還有別的意思是我不會聽懂的？」，接下來，訪談者由喪親者回答此開放式問句的內容中，檢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確，再由此出發，由喪親者引領訪談者到達喪親者更完整的經驗。這部分，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是訪談者能否聽得懂、接得住喪親者所言與字裡行間的深義，具體而言，即 Kvale (1996)所表示研究者求證自己所理解或詮釋的參與者表達之意涵（特別是在訪談當下即求證），應是最理想的訪談之一（詳見頁 145）。

前方有提到研究者「不斷地檢視自己的意識狀態」是否存而不論，又說「訪談者的意識要意向著喪親者的哀傷經驗」，那麼，訪談時，究竟訪談者的意識要意向著何方？若研究者時時返回自身

，是否意識就無法意向著喪親者了？這部分，Bozarth (1998)提到，在治療關係中，有一個「一致——同理」之循環(a genuineness-empathy loop)，即治療師「覺察自己經驗」的能力，可以讓自己更覺察得到案主的經驗；當治療師更覺察得到案主的經驗，那麼，治療師就更能覺察自己的經驗。Mearns 和 Thorne (1988)也說：「諮商關係需要我們在與案主互動的時時刻刻裡，最為專心在且覺察到我們自己的思考、感覺、感官、與直覺。事實是，我們不只聚焦在案主的世界裡，我們也很注意與自我內在的接觸，就像和案主的內在接觸一樣多，也不停地觀照(monitor ceaselessly)與案主的關係。」(頁 1-2)

雖然 Bozarth、Mearns 和 Thorne 說的是「治療關係」，但本文前述已說明治療關係中的信任、放鬆等特質，在「訪談關係」也同樣重要。Rogers (1980)也表示：「若有較佳的自我覺察，那麼，個體較可能作出依最多資訊而判斷的決定，這樣的決定較無內射，會是一個較與個體內在流動(evolutionary flow)合鳴的、有意識的決定。」(頁 127)

「覺察」亦非只在「治療關係」可用。覺察如同反思，是一種能力——或亦如「反思」般地涉及「意願」——是訪談者所應具備。訪談關係是人際互動的一種，是雙向的；訪談者在訪談關係裡若能夠覺察自己，自然而然地也進入對「喪親者」與「這份訪談關係」覺察之循環，再表達「同理」來達成「互為主體」，那麼，喪親者可能更願意釋出完整經驗。

現象學訪談與 PCA 特徵有許多共

鳴之處。現象學取向「關係建立」、「氛圍」之強調，讓研究訪談與 PCA 治療在態度上幾乎無別，「由參與者帶領訪談者」之特色(Brice, 1991b; Kruger, 1979)，亦符合 PCA「案主帶領，心理師跟隨」的互動姿態(Bohart, 1995)。而 Patton (1990)和陳向明 (2002)也提到，「訪談」是要趨近參與者的角度，此亦為 PCA 所強調。惟，潘淑滿 (2003)則認為研究訪談比心理實務工作者的晤談來得開放，因為前者有較多的聆聽；但她是基於助人專業工作者是透過「問問題」來主導晤談話題而希望能解決問題，這在以現象學為哲學基礎的 PCA 並非實情。

三、研究者在現象學訪談階段之反思

訪談者以現象學取向進行訪談，意識意向著喪親者，只有喪親者的世界，只站在喪親者的立場，喪親者面對一位全心全意意向著自己喪親經驗的訪談者，那麼，他想要訴說、想要被了解的需求啟動，他得以在足夠信任的氛圍裡，暢所欲言、沒有防衛、自在地談，「讓經驗如其所是，(說者)回顧它，讓它的內容更加清晰」(Keen, 1975；引自 Moustakas, 1994)。這是研究者據以分析的原始資料，它的品質是研究品質的重要基礎(Kvale, 1996)。

而進行現象學訪談時，訪談者內在「意識轉換」與外顯的「關係建立」是同時發生，反思也是同時進行。面對訪談者如此「忙碌」的狀態，本文以下點出一些基本提醒，其實都是研究者的「自我要求」：「我是否宣稱『半結構訪談』，實際執行卻非如此？」；「我現在正在存而不論的狀態嗎？」或「我是否隱微

地帶著自然態度（假設）？」；「我是否勉強喪親者回答我的提問？」；「我讀得出喪親者話語字裡行間的意涵？並以喪親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回映或回應？」

再更細緻且值得深思的是，研究者「尊重喪親者為主體」的態度，對「互為主體」的理解，是否真的落實到面對喪親者之時？在訪談歷程中，若喪親者的哀傷反應多元(Shuchter & Zisook, 1993; Worden, 2009)、兩難又矛盾(Brice, 1991a; Stroebe & Schut, 1999)，這些自然流露的經驗萬一溢出研究問題、訪談題綱之外，訪談者若是想辦法將話題引導到符合訪談題綱，這樣有無避免將喪親者視為客體？訪談時，喪親者有「話語權」，然其範圍只能侷限在研究者的研究主題裡，喪親者算是主體嗎？訪談者多數時間為探詢者，喪親者是把自己的喪親經驗釋出的一方，訪談者是提問與接收資訊的另一方(Brinkmann & Kvale, 2005)，如此個人資訊透明度的差異，這是「互為主體」嗎？如此「話語權」的侷限、個人資訊透明度的差異，喪親者和訪談者真的是「互為主體」嗎？

從外顯的「關係」來看，在實際進行研究時所面臨的倫理議題，尤其是訪談者與喪親者當下即席互動而產生的倫理決定與倫理行動，恐怕比研究倫理要求、或遠比通過 IRB 審查，更為真實而細緻。Rosenblatt (1995)提到，在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可以運用「過程中的同意」(processual consent)，即訪談者敏覺到參與者敘述喪親經驗可能過於深重而難以繼續，訪談者視情況而重覆提醒參與者是否需要停止談話。Dalberg 等人(2008)也有一樣的提醒。

若以「權力關係」來看，在訪談階段，權力是在參與者手中，參與者決定要釋出多少經驗(Kvale, 1996)，但是，Patton (1990)也表示，訪談資料的品質大抵是由訪談者來決定。這其中訪談者可以掌握的因素之一是「關係建立」的能力。訪談者或許奮力地建立訪談關係，好讓參與者完整描述自己的故事；但參與者可能未加覺察的是，訪談者或許將「獲得訪談資料的完整性」置於「參與者的福祉」之上，亦即研究者「自己」的立場優先於「參與者」的。一旦訪談完成，權力逐漸轉向訪談者，因為接下來，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權就屬於研究者了。這也是何以 Kvale (1996)強烈批判，溫暖信任的關係，把底下的權力流動掩蓋了。Brinkmann 和 Kvale (2005)認為，這種虛假的友誼(faking friendship)其實都是以研究者為主，他們依自己的研究目的蒐集資料、分析，決定哪些資料要公開；相對之下，參與者在資料提供完畢就「被再見」，就像本文前言所提到的情境：「他們災後經歷了許多專家學者蒐集完想要的資料後就不曾回頭」。

而如此權力關係所帶來的倫理議題，很可能是可以化解的。訪談者（研究者）可以反思自己與參與者的權力關係：「我進行訪談，為了自己、為了喪親者或為了研究領域…等因素的比重如何？」；「我看得到訪談中的權力關係嗎？是怎樣的關係？」；「我明白與喪親者建立信任的訪談關係與友誼無關。但是，蒐集完參與者的喪親資料之後，我還要與參與者維繫關係嗎？若要，要維繫多久？頻率？」

還有更多例子，皆可信手拈來，在在可見研究者與喪親者所站的「相對位置」。接下來，研究者就要時時檢視自己並達成：「與參與者如此的相對位置，是足夠『尊重』嗎？」

本段落末了是要由「喪親者」與「理論模式」的距離，看向研究者反思。現象學取向「存而不論」一直避免研究者帶著理論或自己原有之價值觀、喜怒哀樂、想望…等前概念影響喪親者。事實上，理論知能本身沒錯，是研究者運用的姿態才是重點。喪親哀傷的理論確實多來自人類的經驗，研究者可能也希望透過研究的累積促使領域前進，所以我們致力於專業產出；長遠而言，我們期望喪親者能夠調適、回復應有的生活功能或完成哀傷任務，以及獲得助益。縱使如此，這些學術專業考量和努力不代表喪親者要被套進理論，遑論在有關哀傷的個別化與多樣性，已多有哀傷文獻可佐(如：Bowlby, 1980; Lehman et al., 1986; Parkes, 2002; Shuchter & Zisook, 1993)。究竟，對於「參與研究」，喪親者知覺、感受到什麼了？這樣研究的著墨並不多，可能僅有 Cook 和 Bosley (1995)試圖理解喪親者參與研究的感知。在對喪親者「同意參與研究」的主觀世界所知不多的情況下，若研究者持續反思，會不會發現前段所述這些專業工作者的「希望」框架了、壓迫了喪親者？這些期望會不會冒犯了喪親者哀傷的進程與步伐？喪親者可以拒絕「被期望」嗎？或是，這些「希望」、「期待」，有多少是研究者對自己專業表現的想望？研究者看得到嗎？若研究者換到喪親者的立場，會希望有一位研究者如是對待喪親的自己嗎？

伍、現象學取向分析步驟與結果取決於研究者的「意識轉換」，並論研究者反思

至少 Keen (1975)、Giorgi (1985)和 Moustakas (1994)皆有提出現象學取向的分析步驟。步驟的細述，請讀者自行閱讀原典。若以 Moustakas (1994)發展的現象學分析為例，共分為存而不論(Epoché)、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想像變異(imaginative variation)、結構上的綜合(structural synthesis)等四個階段，Giorgi (1985)的分析步驟也不出這些順序，較特別的是，他強調要將參與者的日常生活語言轉化為心理學語言，但終究會轉回普遍性描述(general description)。

從「意識」來看，現象學取向的分析步驟即是意識轉換的歷程。王純娟(2016, 頁 163)以下方的關係強調「意識轉換」的歷程(見圖 1)。

圖 1 意指個體由日常生活裡採自然態度²⁰的經驗意識，在「存而不論」階段，經「懸置」，研究者將前概念置入括號，參與者所提供的原始資料在研究者的視域(horizon)中，都有相同的重要性，此時，研究者的經驗意識轉換為純粹意識，自然態度轉換為超驗態度；Husserl 表示，以如此「超驗態度」而生的直覺之歷程，是對物的一種意識，即為「本質直觀」(eidetic seeing) (McLeod, 2001)。研究者跳出既有框架(thinking out of the box)，運用直覺、想像力，透過想像變異，發現所研究現象不可或缺的本質、結構。Husserl 所指的「直覺」

²⁰ 同註 18。

是，無論是知覺或想像，個體所經歷到的物體的存在浮上意識(the experienced presence of any object to consciousness, be it perceived or imagined.) (Finlay, 2009)。Moustakas (1990)亦言，「直覺」

是我們「知覺一個現象，觀察這個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地檢視各種線索，直到我們能夠推測真實(the truth)」(頁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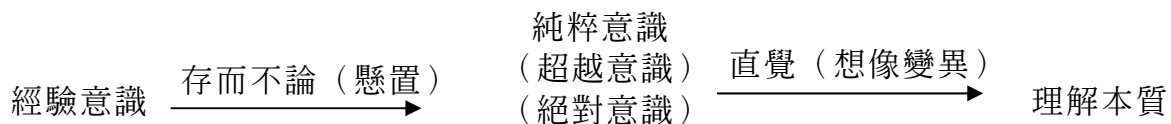


圖 1. 現象學取向研究者的意識轉換

就我所審查的文稿中，所常見的書寫方式是以「分類」方式呈現研究結果，接下來，在每一分類之中，研究者先描述一段話，約略是簡述接下來要引用的參與者逐字稿，後續再引述幾個參與者的訪問內容來支持自己的這段話。例如，何賢文、許鶯珠 (2007) 訪談喪子母親，以現象學取向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由五個主軸組成。這樣寫出來的研究結果都僅反映出研究邀請的幾位喪親者的訪問資料，而看不到「所研究現象具普遍性的經驗本質」的描述。甚至有研究者宣稱進行現象學分析，之後研究結果的呈現，乃全然地套用一個理論架構，例如，使用 Worden 三十多年來(1982, 1992, 2002, 2009)的情緒、認知、行為、生理之類別；讀不到由喪親者角度所浮現的經驗本質。

由於讀者或審查委員總是只能閱讀結果報告，對其研究歷程僅能臆測；惟現象學來自歐洲哲學領域，其中分析步驟中之「想像變異」，恐怕極為困擾臺灣諮商輔導領域中人；但「想像變異」是

很重要的階段和狀態，它如同畫龍點睛，縱使實際進行質性研究所邀請的喪親者人數並不多，卻能夠讓現象學分析以少數幾人的訪談資料，因「想像變異」而描繪出該被研究經驗的普遍性描述。運用它所找到的「結構」，也不易理解。再加上前述所提到的審查文稿或有未臻該哲學觀意旨之分析步驟或研究結果，因此，此段落以下篇幅主要著墨在「想像變異」。

一、研究者經過「想像變異」，方可得研究現象之結構／本質

所謂「想像變異」，Keen (1975)認為，是研究者以越多種方式來觀看一個經驗越好，以看出越多不同的意義。Moustakas (1994)將之具體化為「運用想像力、不同參考架構、運用不同極(polarities)甚至是相反顛倒，儘可能地由不同角度、立場、角色或功能來趨近所研究的現象」(頁 97-98)。Finlay (2009)說是要讀到「字裡行間、意在言外」之意。若具象地以表演的舞台來看

，「想像變異」是想像該現象被呈現在諸多視域的背景之前（而凸顯），據以了解整個現象的意涵為何(imagin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phenomen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various horizons in attempt to see what the total phenomenon means.)

（Keen, 1975, 頁 38），因此，舞台後方以不同的布幕(backdrop)作為背景，將顯現出表演者所不會改變的身影、風貌、特色；這個不同「布幕」，即是運用想像變異而得出之「結構」。Keen (1975)即言：結構，隱微而重要。由陳榮華（1990）、Keen (1975)和 Moustakas (1994)的討論可以得知，「結構」、「意義」與「本質」三個概念可以畫上等號。例如，Keen (1975)表示：「經驗的結構即是經驗的意義」（頁 19）。Husserl 所謂的本質(Eidos; essence)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是「事物在結構上的原理(principle)」，是「經驗事物可能的條件」，是「事物得以構成的形式條件」（引號均引自吳汝鈞，2001a，頁 12）。因此，當現象學研究在意識指向現象自身時，在運用「想像變異」而得「結構」、「意義」與「本質」時，已經逼近現象本質了。

除了「布幕」比喻之外，「結構」是什麼？根據電子字典²¹，結構是建築物、組織的形式(mode)，是部分或元素的組成(arrangement)，它也反映了一個組織或是這些元素之間的關係。《西洋哲學辭典》也定義：「哲學中指一個整體之不同階層的秩序，而整體中包含從屬的局部秩序。康德已應用這一概念表示一個有機體各部分之有意義的統一。」（林安

梧，2009，頁 143），因此，「結構」涉及構成整體或組織的組成、關係、階層與秩序。

若是落實到現象學分析，Moustakas (1994)列舉像是時間、空間、物質、因果、自我、他人…等，都算是具普遍性的結構，例如：Brice (1991b)提到的「一個特定的時刻」就屬「時間」方面的結構。Moustakas 並另提到，會促發脈絡特性(textural qualities)、情感、感官經驗、思考等的條件(conditions)與既存潛藏且緊密地結合於脈絡中被發現或解釋(account for)的，即是結構（詳見頁 78、79）。

「想像變異」要如何操作呢？在實際執行時，「想像變異」的方式不止一種，McLeod (2001, 2011)、Giorgi (2009)提到「移除法」、Moustakas (1994)與陳榮華（1990）主張用「窮究法」。「窮究法」並不難了解，只是難以做到充分；McLeod (2001)也說，若該研究現象有些角度(aspects)是隨著情境(circumstances)而存在的，就要去除，因為已不具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準則。現象的本質必須是具普遍性與恆常性。因此，進行「想像變異」時，資料分析者持開放的態度(Finlay, 2009; Keen, 1975; McLeod, 2011)，放開自己的意識，從各種角度、方式、可能性…等，來意圖著這個現象原已既有的意義，來區辨恆常的(constant)與可能有變的(McLeod, 2011)，目的是為了尋找該研究現象可能的意義與本質(Giorgi, 2009; Moustakas, 1994)。McLeod (2011, 頁 89)以這兩個提問來提醒：「若要讓此現象異於我們所要研究的，那麼，『什麼』需要被改變

²¹ <http://www.dictionary.com/browse/structure>

？」(“what would need to change to make this into a different phenomenon?”)、「這個現象的極限在哪裡？」(“What are the limits of the phenomenon?”)。其中，第二句即表示，超出這個現象的極限，也就不屬此現象了。第一句的「什麼」“what”即「結構」，即「本質」，就是研究現象所不能夠被拿掉的骨架，它們必須支撐這個現象，否則此現象將無以為繼，不再是同一個現象；此亦如同 Moustakas (1994)的提問所顯示：「這個現象何以成為如此這般呢？」(頁 98)，所以要去找出如何(“how”)、找出重要的、恆常的「因素」、「條件」而使得此現象存在。再以上述「布幕」之比喻，有哪些布幕顯現出表演者恆常不變的特質？即為「結構」；若有布幕讓表演者顯現得有異，此布幕便非屬「結構」了。簡言之，進行現象學分析的研究者，透過想像變異，以找出具普遍恆常不變的結構／本質；重點在於「進入想像的境地，同時仍保留正在知覺的經驗」(Langdridge, 2007, 頁 20)，猶如研究者於內在世界天馬行空，自由不羈，假以時日，驀然找到或趨近研究現象的「同」或「常」。

惟，「想像變異」具體操作不易，所以本文花這麼多篇幅說明其義。請讀者在正確理解「想像變異」之後，再據以操作。在方式之上，無論是 Keen (1975)所言之「越多種方式越好」，或 Moustakas (1994)的「儘可能的各種不同」，都是綿密的工夫；這樣的「厚工」，我認為也隱含資料分析者要有足夠時間跟原始資料「相處」。McLeod (2011)的說法則是，要花時間逗留在研究現象(linger “in”

the described situation)。由於現象學取向牽涉到意識狀態的轉換，意識狀態是在個人內在發生，因此，雖然「厚工」，現象學分析很可能只能一人進行。Husserl (1954/1970)即曾說道：「我身為執行『存而不論者』，縱使尚有他人，縱使他們與我共同執行『存而不論』，他們——同其他人——和其整個行動生活(act-life)都被我包含在內。在我的存而不論中，這個世界作為現象(world-phenomenon)惟獨就屬於我的。此『存而不論』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哲學上的遺世獨立(philosophical solitude)，這種哲學上的遺世獨立是真實的激進(radical)哲學所必要的基礎方法。」(頁 184)

這段話是在談「存而不論」，涉及個體內的主觀意識。而直覺、想像力也是個人的。對研究者而言，每個人——包括研究團隊成員——都屬現象的一部分，無法與之一起進行「存而不論」。McLeod (2011)在其專書第四章「現象學研究」(“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開宗明義也表示，Husserl 所發展的現象學研究是研究 Husserl「自己」的個人經驗，所以 Husserl 恐怕很難同意現象學取向的分析可以應用到心理學且很多人一起進行分析。究竟 Husserl 在哲學領域的「存而不論」與社會科學領域(喪親哀傷研究屬之)的「存而不論」是否相同，這是臺灣諮商輔導領域內以現象學取向進行資料分析的研究者所需要再思考與回到原典之處。

二、現象學取向之「研究結果」應為本質(essence)，而非主軸(theme)

當研究者採取現象學分析，遍讀逐字稿後，再由意義單元彙整出主軸，此時分析尚未完成；現象學分析的研究結果是要能夠描述所研究經驗具普遍性、恆常性的經驗本質。就「產出」而言，它是在「存而不論」而臻之純粹意識狀態下，研究者完成單一參與者的個人脈絡描述文(individual textual description)，接下來就要透過「想像變異」來形成「結構」，而寫出同一位參與者的個人結構描述文(individual structural description)。待所有參與者的這些描述文都完成之後，再連結所有參與者的脈絡描述文和結構描述文，而寫成最終的綜合脈絡和結構描述文(composite textual-structural description)。這「綜合脈絡和結構描述文」是依 Moustakas (1994)的說法，他以一章的篇幅（第七章）將上述各式「描述文」作說明與呈現範例，其中 Fischer 和 Wertz 於 1979 年的犯罪受害(criminal victimization)為許多文獻所引用，如：McLeod (2011, 頁 91-92)、Moustakas (1994, 頁 142-143)，更被重印(Fischer & Wertz, 2002)，請讀者自行參閱。Giorgi (2009)的現象學分析結果則是由結構的特定描述(specific descrip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henomenon)到普遍性描述(general description)，他以嫉妒經驗(jalousy)為例，用一章的篇幅（第六章）由訪談逐字稿、意義單元，到結構描述文，作一示範；至於喪親哀傷主題，Wang (2012)描述了喪子女母親「思念」的經驗本質，均請讀者自行參閱。這些

最終的描述文，雖然學者用詞不同，也雖然 Fischer 和 Wertz 說過現象學取向的研究結果寫法各異(McLeod, 2011)，但它們必然都是符合現象學原則的描述(description)或陳述(statement)。Giorgi (2009)亦言，現象學取向的研究結果總是以一般的文字撰寫，要避免與理論有關的專有名詞。McLeod (2011)表示研究結果之目的在於「產生一個日常經驗裡，特定現象的極盡(exhaustive)描述，以達成一個『物自身』之本質結構的理解」(頁 25)。

而因為在研究進行過程中，研究者的意識狀態會影響研究結果的呈現，因此，針對喪親哀傷主題之研究，本文以下有一些提醒：

1. 若真的要進行現象學研究，研究者需要理解「意識轉換」的重要性並達成之。
2. 若是研究者真的能採取開放的態度，懸置先前對理論、對研究問題等可能的預設，存而不論地進入喪親者個人獨特的內在世界，從喪親者的視野來理解所談的意義，再經過「想像變異」等資料分析步驟後的「描述」，才是現象的本質。
3. 研究者若能確實「懸置」而臻純粹意識，就不會遠離現象學「回到物自身」的核心概念，即「回到喪親者的經驗本身」。
4. 在「研究結果」部分，研究者需了解現象學所談的「結構」的意涵。
5. 若真的由「人」的角度出發，就不會有理論架構的影子；之後再加上「想像變異」，得出的結果就不會是以分類方式報告主軸，也不會依研究問題進行資料

彙整、回答，或以分類的方式呈現，符合理論模式。

三、現象學「想像變異」與「研究結果」階段，研究者的反思

就研究的執行來看，研究者當然可以發展資料分析的操作步驟，惟 Karnieli-Miller 等人(2009)表示，在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的階段時，倫理的考量最爲重要，我認爲，「倫理」的具體實踐在於研究者「尊重喪親者爲主體」的態度，以及意識狀態的轉換。在分析階段，研究者可以進行以下自我檢視：「我了解自己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哲學觀？或是跟隨學術前輩腳步而不知所以然？」；「我現在正在純粹意識狀態嗎？」；「我這樣算是進行『想像變異』嗎？已由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可能性，運用想像力和直覺來找出研究現象不變的本質？」；「我的分析是否只強調專家觀點，而忽略了以有系統、可靠、符合意識狀態的分析過程以反映喪親者的角度？」；「我是否認爲自己能分析資料、作研究，我是專家，所以喪親者不可能比我更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如何看待喪親者？」

在倫理與權力關係部分，研究者有權力整理、分析、解讀訪談資料，在研究報告裡表達自己的研究結果(Brinkmann & Kvale, 2005; Karnieli-Miller et al., 2009)。這時候，研究者的部分(the person of the researcher)就很重要了(Kvale, 1996)。Kvale 特別指出研究者的兩個特質：敏感於倫理議題，並負責地面對與處置。例如，參與者在信任的訪談關係中所釋出的資料，最終被分析後公開發表，雖然匿名，兩者

的相對位置如何(Brinkmann & Kvale, 2005; Karnieli-Miller et al., 2009)？再如，參與者可以拒絕訪談資料被公開發表嗎？若研究者因有此可能性，而不將分析後初步結果交予參與者過目，這裡的倫理議題爲何？

至於研究結果，縱使囿於期刊篇幅限制，研究態度與反思讓研究者仍能厚實地呈現「尊重喪親者爲主體」的蛛絲馬跡。例如：論文中的「研究方法」段落裡，在經常需要研究者寫出擬邀請喪親者的「條件」，此時，研究者使用的動詞是「『篩選』比較容易『配合』的喪親者」，或是「『邀請』喪親者接受或協助訪談」，便能夠清楚地反映研究者如何看待喪親者。

同時，「反思」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報告裡，向讀者說明自己的立場、在此研究的投入、可能的偏見(biases)，甚至該做卻沒做的部分（詳見 Gergen & Gergen, 2000, 頁 1027）。讀者解讀該研究結果也得以有其自主性，他們能夠因此知道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相對位置與決定如何理解研究結果(Matton, 2003; McLeod, 2011)。

至於研究者如何進行反思，Roulston (2010)提到四種策略：第一，研究者書寫自己的主觀性(subjectivity statement)，批判地檢視自己在該研究案的理論架構、資料蒐集和分析，與參與者的相對位置…等。第二，書寫研究者日誌(researcher journal)以記錄自己在研究歷程中的想法、評論…等。第三，由他人訪問研究者(interview of the researcher)以了解研究者進行該研究的主觀性，如動機…等。第四，對訪談者的作品進行

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er's work)，批判地檢視自己在研究訪談中與他人的互動（詳見頁 120-125）。

研究者進入「存而不論」的狀態，開放地容納喪親者的所思所感所言，以如宇宙般的心量，無條件地涵容喪親者所表達的種種。此能力、心量當然不是一蹴可及。我認為研究者日常時時刻刻的鍛鍊才是必要。這部分，以下僅舉三例。第一例，世足賽 16 強淘汰賽進入最終 PK 階段，你感受得到上場球員的壓力嗎？第二例，在捷運上，你如何看待在博愛座上嬉戲的青少年？若是車廂客滿，有一老人需要座位，而這些青少年無動於衷，這時你覺察得到自己的價值觀與倫理界限嗎？若你練習「存而不論」，意識狀態轉換，這時你看到了什麼現象？第三例，在車水馬龍中，你看到一位身障人士在有限的綠燈時間裡，極度緩慢地穿越斑馬線，同為行人的你，你覺察得到自己的狀態嗎？若練習「存而不論」，意識狀態轉換，這時你看到了什麼現象？

這些可能是我們日常旁觀或是涉入的各種經驗。生活裡所有經驗都可信手拈來，練習感同身受、意識轉換和天馬行空（分別是為「尊重喪親者為主體」、「存而不論」和「想像變異」）。研究者平時鍛鍊自己，進行研究時，展現在研究歷程各個階段各式情境當下，長遠而言，符合人類經驗的學術進程才是可能，也才能夠精進臺灣諮商輔導領域，對領域有所貢獻。

陸、結論

每位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學術小時候」，甚至，一個人縱使已累積知能至取

得博士學位，也才要開始學習獨力完成研究，或許有前人牽引能夠更加事半功倍。我在學術路剛起步時，得緣近距離跟隨並觀察一位學術前輩之研究態度而耳濡目染，影響甚深，亦幸獲得期刊審查委員的提點而有額外的學習，也逐漸形塑自己的研究姿態。現在，我在領域內已有二十年的光景，未曾忘記自己學術生涯剛起步時的生疏。現在，若是有新進的學者願意走上「研究」之路，人同此心，或許他們也需要前人提點，而有此文。

至今，在喪親哀傷主題近二十載，每每看到喪親者哀慟逾恆，就竊自盼望沒有人會遭逢喪親。但喪親難免，此主題之研究，有其必要性。本文第一部分論及喪親哀傷研究者要反思自己的研究態度，特別是倫理與權力關係。第二部分，在知能方面深論現象學取向的「意識轉換」，分別討論訪談與資料分析兩階段的「存而不論」與「想像變異」。討論至今，現象學研究者的姿態，或可簡言如下：姿態上，理論在前，遠離現象學；意識上，存而不論，才是現象學。

本文主要論現象學取向的質性研究，此處要再強調的是研究者應窮究至該主題的原典²²。因為，同樣是現象學哲

²² 我對「原典」的見解，請參註 11。另外，當本文強調「應窮究至該主題的原典」，卻有 2 個二手資料的引用。其中有一個是 Keen 的手稿 (Keen, 1975, 引自 Moustakas, 1994)，無法尋得，另一個是名言之引用（「人無法直視太陽和死亡」）。APA 寫作格式要求二手文獻要儘可能地少，以「一篇論文有 89 文獻佐證」來看，其中有 2 個二手資料的引用，應可接受。

學觀，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理解而致不同的發展進程。例如：Finlay(2009)將現象學研究區分為描述現象學(descriptive phenomenology)與詮釋現象學(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y)，McLeod(2001, 2011)指出，現象學取向的心理學研究法分有 Duquesne 學派的實徵現象學、受 Kurt Lewin 場地論影響的概念交會(conceptual encounter)、存在－現象學研究、和對話式現象學研究(dialogal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等四種傳統(traditions)。McLeod(2011)亦引用 Crotty 的視野：Crotty 批判實徵現象學不及 Husserl 的古典現象學。本文並不細述學者們見解之異，只想稍微拉高視野，從兩位學者的見解看到：現象學具「描述性」特質，此為學者們所肯認。惟，連 Finlay 都認為屬「描述性」的實徵現象學，卻被 Crotty 認為是遠離古典現象學。細讀進學者們各自不同主張，便可見學者們的思考和主張是否符合現象學哲學，亦可見學術領域的進展。

像這樣，一個具哲學觀的分析方法的演進，甚至分流，若我們後世研究者沒有追溯原典，將很容易錯失如此的變化與正確的理解。這些現象學研究的學者們，他們究竟在哪些方面主張有異，是否都仍守住「現象學」的原則，我們研究者基於什麼原因採納哪個論點，都需要研究者徹底理解後的判定。這些都需要回到原典才能辨明。

另一個需要不斷強調的是研究者的「自我要求」。對於其中的「反思」，本文選擇以「提問」(僅為舉隅)代替提供答案，請新進研究者不斷思考，思考人我之間的倫理，也不斷「返回自身經驗

，進行檢視」，這是研究當下與日常時時刻刻進行的工夫，也是行動。本文在每個「反思」段落末了都隱含請研究者「跳出既有框架」、「跳出研究歷程」，回歸時時刻刻，因為「自我要求」是人的態度，而非跟隨專業角色而來的工具。若是跳出專業框架，回到日常，那麼，與周遭環境有關的「權力關係」與「結構性潛意識」也應練習檢視，因為，執行研究時，研究者若毫無質疑地遵從學術領域主流價值或學術前輩的足跡，領域將不易有實質的進程，也難以找到青出於藍的新進研究者，此卻長遠地影響臺灣社會裡人們（潛在案主）的心理健康，間接也影響臺灣社會的發展。

至於本文的限制，本文所鋪陳的，無論是投稿者稿件呈現的共同點，或是我因而回應的審查意見的共同性，這些「共同」或許反映了在我的視野下，對目前臺灣諮商輔導領域在喪親哀傷主題研究的觀察與理解，也或許是我自己的前概念和作為審查委員的標準。因此，期待領域內更多對話，以嘉惠學術後輩，並增進喪親哀傷主題之研究品質。

收稿日期：107.07.12

通過刊登日期：108.02.1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純娟（2016）。你怎麼先走？：由子女驟逝者的哀傷論陪伴模式之建構。新北市：典藏文創。
- 台安醫院（2017年4月24日）。退化性關節炎治療方式的選擇。2018年10月3日引自 <https://www.tahsda.org.tw/m/files/SDM/%E9%80%80%E5%8C%96%E6%80%A7%E9%97%9C%E7%AF%80%E7%82%8E%E9%86%AB%E7%97%85%E5%85%B1%E4%BA%AB%E6%B1%BA%E7%AD%96%E8%BC%94%E5%8A%A9%E5%88%86%E6%9E%90%E8%A1%A8.pdf>
- 李明亮（2001）。蛻變與重生。見陳錦宏等譯：災難與重建：心理衛生實務手冊（頁5-6）（原作者：D. Myers）。臺北市：心靈工坊。
- 吳汝鈞（2001a）。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上）。鵝湖月刊，26(11)，10-17。
- 吳汝鈞（2001b）。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中）。鵝湖月刊，26(12)，14-21。
- 吳汝鈞（2001c）。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下）。鵝湖月刊，27(1)，57-64。
- 何賢文、許鶯珠（2007）。生命意義的再建構－以喪子女父母為例。生死學研究，6，125-189。
- 林安梧（2009）。中國人文詮釋學。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 林家瑩（1999）。喪失子女的父母失落與悲傷反應及復原歷程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胡幼慧（1996）。多元方法：三角交叉檢視法。見胡幼慧編著：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271-285）。臺北市：巨流。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性研究。臺北市：五南。
- 陳榮華（1990）。現象學大師——胡塞爾。見沈清松編：時代心靈之鑰——當代哲學思想家（頁2-25）。臺北市：正中。
- 張進上（2006）。生命的功課：諮商師的學習。高雄市：復文。
- 張燦輝（1996）。海德格與胡塞爾現象學。臺北市：東大。
- 黃淑清、修慧蘭（2003）。失落的探討：以青少年期父母親過世的成人為例。應用心理研究，20，217-238。
- 蔡佩真（2009）。台灣喪親家庭之變化與探究。生死學研究，10，159-198。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市：心理。
- 嚴祥鸞（1996）。參與觀察法。見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195-221）。臺北市：巨流。
- 蘇鈺壬（2017年9月26日）。漸進式不可逆的腎臟病，需注意早期症狀以減少惡化。2018年10月3日引自 <https://tw.wen8health.com/article/461>

英文部分

- Archer, M. (2007). *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 Human reflexivity and social mobi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g, B. L.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5th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Bohart, A. C. (1995). If we dance, who leads? *Person-Centered Journal*, 2(1), 35-37.
-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 Bozarth, J. D. (1998). *Person-centered therapy: A revolutionary paradigm*. Herefordshire, UK: PCCS Books.
- Brice, C. W. (1991a). Paradoxes of maternal mourning. *Psychiatry*, 54, 1-12.
- Brice, C. W. (1991b). What forever means: An empirical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maternal mourning.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2(1), 16-38.
- Brinkmann, S., & Kvale, S. (2005). Confronting the eth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8, 157-181.
- Brough, J. B. (1991).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E. Husserl,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1893-1917) (J. B. Brough Trans.) (pp. XI-LVII).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Burkitt, I. (2008). *Social selves: Theories of self and society* (2nd ed.). London, UK: Sage.
- Cook, A. S. (1995). Ethical issues in bereavement research: An overview. *Death Studies*, 19, 103-122.
- Cook, A. S., & Bosley, G. (1995).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bereavement research: Stressful or therapeutic? *Death Studies*, 19, 157-170.
- Creswell, J. W.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alberg, K., Drew, N., & Nyström, M. (2008). *Reflective lifeworld research* (2nd ed.). Lund, Sweden: Studentlitteratur.
- Edelstein, L. (1984). *Maternal bereavement: Coping with the unexpected death of a child*. New York, NY: Praeger.
- Finlay, L. (2008). A dance between the reduction and reflexivity: Explicat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39, 1-32.

- Finlay, L. (2009). Debating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Phenomenology & Practice*, 3(1), 6-25.
- Fischer, C. T., & Wertz, F. J. (2002).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analyses of being criminally victimized. In A. M. Huberman, & M. B. Miles (Ed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companion* (pp. 275-30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ntana, A., & Frey, J. H. (2003). The interview: From structured questions to negotiated tex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2nd ed.) (pp. 61-10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ergen, M. M., & Gergen, K. J. (2000). Qualitative inquiry: Ten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1025-104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iorgi, A. (1985). Sketch of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In A. Giorgi (Ed.),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p. 8-22).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Giorgi, A. (2009). *The descriptiv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in psychology: A modified Husserlian approach*.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Husserl, E. (1970).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D. Carr Tran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 Husserl, E. (2002).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W. R. Boyce Gibson Trans.). London, U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3)
- Janzen, L., Cadell, S., & Westhues, A. (2004). From death notification through the funeral: Bereaved parents' experiences and their advice to professionals.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8(2), 149-164.
- Jordan, J. R., & Neimeyer, R. A. (2003). Does grief counseling work? *Death Studies*, 27, 765-786.
- Karnieli-Miller, O., Strier, R., & Pessach, L. (2009). Power relation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2), 279-289.
- Keen, E. (1975). *A primer i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Kruger, D. (1979).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Kübler-Ross, E. (1969).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NY: MacMillan.

- Kvale, S. (1996).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angdridge, D. (2007).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 Harlow, England: Pearson.
- Lehman, D., Ellard, J., & Wortman, C. (1986). Social support for the bereaved: Recipients' and providers' perspectives on what is helpful.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438-446.
- Lichtman, R. (1982). *The production of desire: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o Marxist theor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Lincoln, Y. S., & Guba, E. G. (2000).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163-18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ynch, M. (2000). Against reflexivity as an academic virtue and source of privileged knowled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7(3), 26-54.
- Maton, K. (2003). Reflexivity, relationism, & research: Peirre Bourdieu and the epistemic conditions of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Space & Culture*, 6(1), 52-65.
- McKay, M., & Tighe, J. (2013). Talking through the dead: The impact and interplay of lived grief after suicide.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68(2), 111-121.
- McLeod, J. (2001).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UK: Sage.
- McLeod, J. (2011).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2nd ed.). London, UK: Sage.
- Mearns, D., & Thorne, B. (1988). *Person-centred counselling in action*. London, UK: Sage.
- Moustakas, C. (1990). *Heuristic research: Design,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 Moustakas, C. (1994).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Oxford, J. (2008). *Community psychology: Challenges, controversies, and emerging consensus*.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 Parkes, C. M. (1995). Guidelines for conducting ethical bereavement research. *Death Studies*, 19, 171-181.
- Parkes, C. M. (2002). Grief: Lessons from the past, visions for the future. *Death Studies*, 26, 367-385.
-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 Pfänder, A. (1967). *Phenomenology of willing and motivation and other phaenomenologica*. (H. Spiegelberg Tran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 Raskin, N. J., & Rogers, C. R. (2005). Person-centered therapy. In R. J. Corsini, & D. Wedding (Eds.),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7th ed.) (pp. 130-165). Ontario, Canada: Thomson Learning.
- Rogers, C. R. (1980). *A way of being*.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Rogers, C. R. (1986). Reflection of feelings. *Person-Centered Review*, 1(4), 375-377.
- Rosenblatt, P. C. (1995). Ethic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with grieving families. *Death Studies*, 19, 139-155.
- Rosenblatt, P. C. (1997). Grief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In C. M. Parkes, P. Laungani, & B. Young (Eds.), *Death and bereavement across cultures* (pp. 27-51). London, UK: Routledge.
- Roulston, K. (2010). *Reflective interviewing: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UK: Sage.
- Rychlak, J. F. (1981).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 and psychotherapy* (2nd e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Shuchter, S. R., & Zisook, S. (1993). The course of normal grief.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pp. 23-43).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man, P. R., & Klass, D. (1996). Introduction: What's the problem? In D. Klass, P. R., Silverman, & S. L. Nickman (Eds.),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pp. 3-27). Philadelphia, PA: Taylor & Francis.
- Simpson, M. A. (1979). *The facts of deat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piegelberg, H. (1982).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tevick, E. L. (1971).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anger. In A. Giorgi, W. F. Fischer, & R. von Eckartsberg (Eds.), *Duquesne studies i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Vol. 1) (pp. 132-148).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Stroebe, M., & Schut, H. (1999).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Rationale and description. *Death Studies*, 23, 197-224.
- van Manen, M. (1997).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2nd ed.). Ontario, Canada: Althouse Press.

- Wahl, C. W. (1959). The fear of death. In H. Feifel (Ed.), *The meaning of death* (pp. 16-29). New York, NY: McGraw-Hill Book.
- Wallbank, S. (1991). *Facing grief: Bereavement and the young adult*. Cambridge, UK: Lutterworth Press.
- Wang, C. C. (2012).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Taiwanese mothers' recollections of the sudden deaths of their children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3(4), 921-942.
- Worden, J. W. (1982).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New York, NY: Springer.
- Worden, J. W. (1992).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2nd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 Worden, J. W. (2002).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3rd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 Worden, J. W. (2009).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4th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 Yalom, I. D. (2000). *Love's executioner*.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 Discourse on Research Attitude and Researcher Reflexivity of Novice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ers in the Grief and Bereavement Field

Wang, Chun-Ch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tudies on grief and bereavement in Taiwan, with an emphasis on research attitude and researcher reflexivity for novice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author's observation, there is a gap between perceptions of the bereaved and the researcher after practical interactions. Besides, when peer-reviewing manuscripts, differences could be found in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in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research. Additionally, for near two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only 26 articles on grief and bereavement published by peer-reviewed journals in the counseling field in Taiwan. All these facts lead me to presenting and discussing crucial concerns in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grief and bereavement studies for novice researche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research attitude of a researcher runs through the whole research process in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The attitude illuminates when a researcher respects subjectivities of the bereaved, when a researcher empathizes with the grief from the bereaved perspective, and when the two share their subjectivities.

Epoché and imaginative vari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view and analysis are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d. A 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er, in an Epoché state of consciousness, creates a relaxing and trustful atmosphere for the bereaved to express his/her experiences freely and for the interviewer to collect comprehensive raw data. Meanwhile, in imaginative variation, which Taiwanese researchers may be unfamiliar with, imagination and intuition out of various aspects and possibilities are practiced, with the researcher reflexivity of how to perform imaginative variation emphasized. The finding of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is to be descriptive, instead of being categorical, of the essence of the experience.

The article attaches tremendous importance to reflexivity. Namely, researcher

reflexivity determines research attitude which further determines research quality. Several mementos in each stage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are suggested at the end of each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of consciousness, grief and bereavement studies,
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 reflexivity, research attitude

Wang, Chun-Chuan (cw9j@gms.ndhu.edu.tw)